

打造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

——管益忻教授访谈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重任和理想夙愿。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梦”是强国的梦、是富民的梦,中国又一次显示出一条世界经济巨龙的神勇。经济的复兴必将带来文明的复兴,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本报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周报》主编、中央军委办公厅原理论秘书,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中心首席专家管益忻。

经济体制改革的三大问题

■ 马海涛

十八大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个人觉得是市场机制的完善、政府的改革和社会问题的重视,可能是这三个问题。市场经济更多地是完善的问题,社会问题要得到重视,另外政府也是要改革的,所以现在看我们很多的“改革”提法,实际上都涉及到政府行为规范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这当中就谈到了财税的改革。而财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现代预算制度的建立,没有构建现代预算制度,我们很多改革就很难说。

财税改革怎么全面和深化,大概有这么六个方面要考虑。

第一个就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这是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国内环境、国际环境,包括我们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这些不确定性可能对中国的财政改革,提出一些新的挑战。

第二要关注的就是城镇化的加速。现在有很多误区,把城镇化搞得妖魔化了,说是被城镇化、城市化了,那么到底什么是城镇化?城镇化是不是把农民都弄到城市去了,给他点钱,最后在城市过两年,钱花完了,变成城市最穷的人。还是要在当地如何解决一个经营的规模化,或者用一个不恰当的词“庄园制”,居住在其中,不能离开那个土地。当然这里还涉及到财税体制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不管你收入的划分,支出责任的划分还是转移支付的设计,没有考虑到流动人口的问题,是以辖区,不变人口作为主要的决策依据,这个问题要考虑到。

第三,要考虑到我们这几年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比如说我们效率优先,但是公平缺失。我们很多公共资源的配置是缺失的,像医疗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还要考虑到我们资源的使用,开发和使用到了极限,这就涉及到资源税的改革。到底定位在哪儿,得要有突破。

第四,我们不得不考虑现在的社会公众对财税改革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现在出台一个东西,网上的反应是非常强烈。这次预算法二审的征求意见,我没有想到30多万条意见(去年24万条意见)。个人所得税,我当时想预算法有几个人去了解?可能就我们这些人觉得预算法挺有用,一般老百姓谁管?可是真的没有想到,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社会公众的公共需求的满足,这个提升我们要考虑到。

第五,我觉得要考虑部门权利和利益的调整问题。我们很多的改革,如分税制的改革,包括我们国库的改革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权利和部门之间的问题,这个不打破,制定的措施很难付诸实施。

第六,我们要考虑到现有制度的整合和协调的问题。这几年财税改革的制度很多,但是这些制度,一个是各自完成的,没有形成合力。还有一些制度所体现的效应递减了,比如说家电下乡的问题等等,是靠财政的短期手段,促使中国消费的提升,我觉得这个项目是在下降的。所以在这个框架之下,我们要考虑到整个的财税问题,当然我们还要去解决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问题。比如,我们现在总是在讲土地财政,我老是不明白什么叫土地财政?这个土地出让金收入到底有多少用于所谓的财政?还有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差距是肯定存在的,但我们解决的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而不是差距的问题,这些可能都是在全面深化财税改革当中要考虑的。

■ 特约记者 董颖

我们要什么样版本的市场经济

亚当·斯密撰写了《国富论》,在深入分析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同时,似乎看到了资本“恶”的一面,于是,同时下大力气地撰写了《道德情操论》,空前地强调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期望人们在从事商品交易、商品经营行为中不断地提高道德水准,以避免“资本主义”的沉沦。谈到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梦”,管益忻教授同样表示:“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宝贵的资源是信任度。”

2012年底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信任度再创新低,这使管教授深切地感受到当前促进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以发展人为核心,提高人的素质,“否则GDP再高也没用,要以优化再造‘软生态’为主,替代过去以发展‘硬生态’为主的发展模式。”这种信任度首要的是,各市场主体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施信,由此培育出市场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各种商品交易中的良性互动,打造出和谐氛围。

“多少年来,做买卖都讲将本求利,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现在看来问题严重。对时下中国的个别企业、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文化的运行发展来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其根本指导思想应该转型,从‘将本求利’转变为‘将责求利’。”管教授谈到,去年延庆大雪,一些人趁机将方便面推销给困在路上的人,卖价高达20元/碗,这就是个典型例子——这样的生意到底该不该做?即便要做的话,能不能卖这么贵?

中国这些年来假冒伪劣满天飞,领域之宽、持时之久、范围之广、为害之烈都是难以想象的。这表明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最

大问题之一就是不负责任、只讲利益——把利润最大化当作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样发展下去,就会把我们企业的经营发展,产业的、经济的发展都引导到斜路上去。现在社会上种种世象矛盾百出,弊端丛生,处处是令人纠结的氛围,正是各种反应的集中凸现。

管教授认为,武汉长江三桥建成后,十年间维修了24次;上海出现了“楼歪歪”等等案例,无疑都在告诉我们,搞市场经济是肯定的,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版本绝不应该把信任度抛到一边,一门心思只看GDP,千方百计地将本求利、搞利益最大化。我们应该一再地强调信任为本、责任为本,以人的素质的“升级换代”为本。“两手都要硬,理念要更硬;‘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人是更要强硬的道理。”

说到“中国的经济社会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该是什么版本?”管教授表示,“我们肯定不能照搬西方的版本,美国的版本对我们来说也不合适,我们要走的是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

那么,怎样打造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呢?管教授说:“打造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尤其要提高对农民的信任度;共产党领导农民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帮他们解决了土地问题,深受农民欢迎。但是现在,土地集中在集体或国家手里,当前迫切的问题是把土地还给农民。农村改革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定程度(部分意义)上把使用权给了农民,目前要做的是要把包括所有权在内的整个产权都还给农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

打造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是一个

名家观点

厉以宁林毅夫互动纵论经济热点

日前,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的第二场记者会上,厉以宁、林毅夫、陈锡文、李毅中、杜鹰、贾治邦六位委员围绕“推动科学发展”这一主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厉以宁与林毅夫,这两位经济学家在回答提问时不时地相互补充,精彩的“林厉互动”,不仅解渴,而且感人。对中国经济的关切之情,在两人的互动中璨然呈现。

西方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利己不利人

“我不赞成有些国家再实行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一种转嫁本国经济危机的办法。”问到如何评价西方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厉以宁开门见山。

“这个问题,我也可以补充一下。”厉以宁刚刚回答完毕,林毅夫便扶起了话筒,“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起大量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入发展中国家,造成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确实给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

面对上述问题,中国如何应对?厉以宁指出了三个方向:加快产业升级、自主创新;加快国内的结构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坚持“走出去”战略。

林毅夫还特别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看到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在观念上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从前他们反对政府干预货币市场,现在也有所改变,认为当一个国家有大量短期投机资本流入的时候,政府可以采取一些资本管制措施,来避免本国货币的急剧升值。”

通过技术创新和缩小收入差距,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中



◎厉以宁



◎林毅夫

等水平后,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难以迈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目前,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进入中等偏上国家行列,是否也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没有升级,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要克服这个陷阱,就要不断地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提升经济的竞争力。”林毅夫说。

“我补充一下,并非只在中等收入阶段才有陷阱,低收入阶段也有陷阱啊,很多国家在人均收入一两千美元时,经济就上不去了。高收入阶段有没有陷阱呢?也有啊,比如当年的希腊,人均收入突破12000美元,后来到了两万多美元,可是现在又下来了。所以,任何阶段都有陷阱。”听到厉以宁具有启发意义的补充,林毅夫频频点头。

林毅夫指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除了极少数经济体,大部分国家都陷入到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当中。究其原因,“是他们没有找到比较快的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道路。”

厉以宁认为,除了林毅夫所讲的,收入差距过大也会导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当社会进入了一个比较和

理论的过程,更是一个实践的探索过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这5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探索大致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8年到2010年——4万亿阶段。这段时间我国经济在西方世界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发展导向,表现在三驾马车的关系上,就主要转化为投资主导了。第二阶段是2010年—2011年末,这个阶段开始注意GDP的质量,并提出稳增长,就是从追求GDP的速度让位于追求GDP的质量。稳增长之“稳”在强调效益,质量实则是增长方式,特别是发展方式转型。“现阶段,从三驾马车上来说,消费被人们空前关注了。有人说,如果一个农民从农村到了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其消费提高8倍,这个推算可能有水分,但这的确是广大农民群众热切盼望城市化、急切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的体现,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农民工身份的变化,农民工之市民化,在整个城镇化嬗变中的重要性。”管教授如是说。

从“4万亿”大投资,经济稳增长中间过渡,再到以城镇化作根本动力源,这个过程表明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版本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必然性客观规律上开始摸到一点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宝贵经验。

“我们内部曾搞过一个报告会,题目叫作‘打造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我们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但又不同于日、韩。概而言之,‘东方版本’的探索总体上还是应以马克思讲的产业资本理论作为基础。我以为今天我们应下大力气研究产业资本问题。”管教授说。

管教授表示,毫无疑问,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确实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有待探索,分配不公、官员财产公布、房产税、三公消费等问题都亟待解决。但是不管怎么说,30年来的经验,是我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据。同时,要清楚地看到,我们有着自己的优势——在30年来的经验总结上,我们按照自己的路线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现在又开始带领人民群众奔小康,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优势。过去有人质疑共产党搞不了市场经济,现在看来我们不仅能搞,而且搞得较好;在国有企业的机制民营化方面,近年来我国的国有企业不断地去国有化;作为世界最大的消费王国,我们有着世界最大的市场,同时,我们的研发能力、自有品牌的建设都在快速发展。

“种种利好条件表明,在现阶段提出‘中国梦’的实现是符合我们实际情况的。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管教授用自己独到的思想和语言描述出了一幅个人心目中的“中国梦”蓝图。

谐的阶段,再加上技术的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我相信是可以跨过这个陷阱的。”

困难虽大,但对宏观经济平稳增长有信心

“林厉互动”,还体现在两人对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上。

厉以宁在回答中认为,2013年我国的宏观经济将稳中有进,完全能够实现7.5%的增长率。今后年份的经济增长,虽然不会是两位数的高速度,但会保持在7%—8%的常态。

林毅夫则更加乐观,“我相信,利用好我国的后发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我们应该有潜力维持20年每年8%左右的增长。”信心写在了他灿烂的笑容里。

“当然,这只是一个潜力,要挖掘这个潜力,需要克服非常多的困难。”林毅夫坦言。

厉以宁的见解异曲同工。他认为,稳增长的前提,是防范潜在的风险。“我认为,最大的风险仍然是金融。”他解释说,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如果大家都一窝蜂地投资搞建设,很可能会加剧潜在的金融风险,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光明日报)



专家观察

如何推进西部城乡一体化

十八大以后,西部的大开发,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以往对西部发展来讲,西部大开发的前十年主要是依赖于传统的红利空间,那么在西部的未来十年的发展里边,可能需要寻找新的红利空间,这种红利空间必须通过创新,特别是通过制度创新,释放空间。

■ 任宗哲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从空间释放的角度来讲,过去西部大开发的目的是缩小西部与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差距,未来的西部大开发中,除了要消除西部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差距,还有缩小西部内部的地区差距,这种消除的实现,关键在于城乡一体。按照刘易斯的观点,第一个拐点到了以后,意味着劳动力由过去的无限供给变成有限供给。第二个拐点,如果实现的话就是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就西部来讲,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这个初始条件,有四种理解。

第一,西部区域发展的差异比较大,主要表现在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的生产总值,以及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的利润差异,再加上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这四个方面,都表现出来了。在西部地区的内部,差异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初始条件,西部城乡一体化,它面对的是生态的环境脆弱。第三个初始条件,就是西部地区面临的双层刚性的二元结构的制约,也就是说首先从农村和城市均有这种二元结构。从城市来看,既有现代的工业部门,也有传统工业部门;从西部地区的农村来看,传统农村和现代农业同时并存。第四,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滞后。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是51.3%,而西部平均水平不足45%,贵州和西藏最低,分别是35%和25%。从这样一种初始条件出发,西部地区的城乡社会的一体化发展,应当针对不同的地区,按照不同的功能选择不同的模式。

西部地区的城乡发展可以有四种模式:第一类就是都市区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模式,这是以大都市和中心城市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工业基础也比较好,比如说像西安这样一些区域;第二类就是资源富集区的模式,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形成大范围的富集区,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快,但是就业弹性低,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国富民穷的矛盾;第三类农业区的城乡一体化,这种结构单一,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比较低的区域在西部还是为数不少的。这一类地区主要是一些自然条件比较好,可以实施一种小城镇带动模式,通过这种小城镇带动,来实现城乡一体化;第四类,生态脆弱区的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模式。这类模式因为生态脆弱区具有抗外界的干扰能力比较差,自身稳定性比较差,在这种情形下,陕西已经实施了移民搬迁的模式,通过贫民区连绵开发的模式,把人口迁移到比较好的地区,既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又使得生态的脆弱区远离人类破坏。

从初始条件出发,按照不同的功能,选择四种不同类型的城乡一体化模式。

(本文系根据作者在“财经战略年会2012”上的发言录音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